

论《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对《史记》的接受

彭国怡^{1,2}

(1.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广西南宁 530006;2. 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南宁 530006)

[摘要]越南史官吴士连撰史书《大越史记全书·外纪》五卷、《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十卷。他熟悉中国史书,效仿《史记》《春秋》编撰。在编排上,他借鉴司马迁《史记》的纪传体体例、时间编排、史事编排,形成“神话传说—王朝纪事—帝王个人纪事”的叙事结构,同时也参照了司马光《资治通鉴》、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两书;在笔法上,他沿用《春秋》《史记》“春秋笔法”的褒贬,采用《史记》“借异传人”、互见笔法,突出帝王人物形象;同时,吴士连还效仿《史记》“太史公曰”论赞,表达著史立场。吴士连是在借鉴《史记》的基础上,尝试构建起古代越南的史学体系,教化越南文臣。吴士连所构建的古代越南史学体系,被后来的史官范公著、黎僖等继承,并不断完善。

[关键词]《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史记》;吴士连;司马迁;接受

[中图分类号] K092; K333; K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711X(2026)11-0195-04

doi: 10.3969/j.issn.2096-711X.2026.11.065

[本刊网址] <http://www.hbxb.net>

越南官修史书《大越史记全书》,自越南后黎朝圣宗洪德年间至熙宗正和十八年间(公元1470—1697年),历多代多人编纂而成。越南史官吴士连在黎文休《大越史记》、潘孚先《大越史记》、胡宗鹭《越史纲目》基础上,编《大越史记全书·外纪》五卷、《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十卷,计十五卷。后范公著在此基础上纂修,增《本纪实录》五卷、《本纪续编》三卷;黎僖又增《本纪续编追加》一卷,共二十四卷本,由此定本。

学界已关注到《史记》对越南汉文文献的影响,越南国家图书馆有馆藏《史记》刻本(编码R.3400,数字编码nlvnpf-1490-08,尺寸30厘米×18厘米)。如田志勇《越南古代汉籍“史记”类文献述要》指出越南汉籍普遍使用“史记”名称,可能受《史记》影响;叶少飞《越南后黎朝史臣吴士连史学思想探析》、彭崇超《试析〈大越史记全书〉的体裁与体例》、丁光忠《论〈史记〉与〈大越史记全书〉》均指出《大越史记全书》与司马迁《史记》、司马光《资治通鉴》、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关联性。以上文献,对《史记》具体在越南的传播情况,仍有探索空间。

本文所述“外纪”,指的是《大越史记全书·外纪》五卷,吴士连所撰。《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参照中国两汉以前的历史记载甚多,《史记》又是东汉以前史书的集大成者,二者在时间、内容上存在重合。故以五卷《外纪全书》为样本,探讨对《史记》的接受,有一定合理性。针对此,探讨司马迁《史记》对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编排逻辑、使用笔法、立场表达、史学体系构建的影响。

一、吴士连借鉴《史记》本纪的编排逻辑

吴士连编撰《大越史记全书》,对司马迁《史记》的借鉴,明确见《拟进大越史记全书表》:“效马史之编年,第惭补缀;法麟经之比事,敢望谨严。”其中“马史”指的是司马迁《史记》,“麟经”指的是《春秋》,“编年”“比事”之语,可见吴士连熟悉《史记》《春秋》的编纂体例、笔法,并以此作为效仿。

首先,吴士连编撰《大越史记全书》时,借鉴《史记》纪传体的叙事方式。司马迁《史记》首创纪传体体例,有“本纪”“世家”“列传”“表”“书”。其中“本纪”为记帝王之事,有十

二篇。“本纪”以纪传的方式塑造帝王人物,如《秦始皇本纪》《高祖本纪》分别塑造了秦始皇、刘邦的人物形象。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分为“外纪”“本纪”,明确“纪”只记载帝王级之事,与司马迁“本纪”记帝功的作用相仿。《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出自吴士连之手:“……取先正二书,校正编摩,增入外纪一卷,凡若干卷,名曰《大越史记全书》。”《大越史记全书·外纪》记载的内容均是越南与中国历史交叉之事;《大越史记全书·本纪》记载的内容是公元968年越南建立第一个独立王朝丁朝后的帝王之事。“外纪”与“本纪”,内容实际为“外纪”与“内纪”之分。此外,吴士连也是以纪传体的方式记叙人物,如《鸿庞氏纪》的涇阳王形象,《土王纪》的土燮形象,这些与《史记》人物的叙事方式相仿。

其次,吴士连在《大越史记全书》外纪编排的逻辑上,借鉴司马迁《史记》,同时也借鉴司马光《资治通鉴》、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将《史记》十二篇“本纪”、《资治通鉴》与《大越史记全书》十四篇“外纪”对比可知:其一,在吴士连所构建的越南史书结构中,公元3世纪前的时间逻辑编排,明显参照《史记》。主要是按时间顺序对帝王人物、事件进行排列,时间跨度大。《史记》十二篇“本纪”,按时间顺序编排五帝传说到汉武帝史,时间跨度三千余年。《大越史记全书》十四篇“外纪”,也是按时间顺序编排,从鸿庞氏传说到吴纪十二使君之乱,时间跨度四千余年。都时间跨度较大,且追溯历史源头、始祖的时间相当,吴士连言鸿庞氏是“其始祖出于神农氏之后”。其二,公元3世纪前的史事编排逻辑,《大越史记全书》与《史记》也一致,形成“神话传说—王朝纪事—帝王个人纪事”的叙事结构。《大越史记全书·鸿庞氏纪》《大越史记全书·蜀纪》明显参照《史记·五帝本纪》所编纂。司马迁在编撰《史记·五帝本纪》时曾述:“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於他说。……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据上所述可知,司马迁曾周游各地,

收稿日期:2026-1-9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2021年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资助课题“17世纪越南使臣咏三国人物诗研究——以《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为中心”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1KY1538);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2023年度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科研项目”资助课题“10—19世纪中越古代文体交流”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XS2306)。

作者简介:彭国怡(1995—),女,广西钦州人,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讲师,广西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越南汉文学研究。

请教有学识之人,收集神话传说素材,同时阅读书籍如《春秋》《国语》,整理编成《史记·五帝本纪》。而按吴士连《纂修大越史记全书凡例》中“参与北史、野史、传志诸本,及所传授见闻,考编辑为之”“外纪所载,本之野史,其甚恠诞者,削之不录”所述,“北史”即越南对中国历史的称呼,反映出吴士连在撰写《大越史记全书》时,参照了中国史书,同时对野史传记有所选择,形成了《鸿庞氏纪》《蜀纪》塑造的泾阳王、雄王、蜀王传说。二人收集素材的过程、神话传说的叙事方式,并以神话构建史书源头的结果一致。其三,公元前3世纪后的《大越史记全书》叙事编排,参照司马光《资治通鉴》、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更多。按吴士连《纂修大越史记全书凡例》说法:“赵纪当北朝汉高、惠、文、景之世,以建亥为岁首者,庶考之朱子《纲目》,不为谬矣。”吴士连撰写《大越史记全书·赵纪》部分(即对应《史记·南越列传》内容),参考自朱熹《资治通鉴纲目》。这是因为《史记》只记载至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大越史记全书》无法参照此后之事。司马光《资治通鉴》,以及在司马光基础上校订而成的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就成了吴士连最合适的参考。所以在吴士连的史笔中,一方面保留了如《大越史记全书·土王纪》《大越史记全书·征女王纪》的个人纪传叙事,一方面又有《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事详时简”的特点,从而构成了《大越史记全书》既有编年体,又有纪传体的史书格局。

二、吴士连借鉴《史记》春秋笔法、“借异传人”笔法

吴士连除了对《史记》的叙事逻辑有深刻理解以外,他理解、借鉴使用了《史记》的编纂笔法。主要体现在春秋笔法、借异传人两种笔法的使用上。

(一)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沿用《史记》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并不是《史记》首创,《左传·隐公元年》中就有“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的春秋笔法使用。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理解《史记》对春秋笔法的运用,也借“春秋笔法”对君王行为褒贬。

先是吴士连对《史记》褒贬称呼的沿用,如《大越史记全书·蜀纪·安阳王》:“庚辰三十七年,秦始皇吕政二十六年。秦并六国,称皇帝。时我交趾慈廉人李翁仲,身長二丈三尺……”,编者引《史记索隐》注吕政来源。事实上,秦始皇的姓氏有“嬴”“赵”“吕”之争,“嬴”为姓、“赵”为氏均有一定说法可取,“吕”只见司马迁《史记》之说,一般认为不可信。但司马迁“吕政”之说,也导致了后世许多对吕不韦与始皇帝关系的猜测。吴士连偏偏选择“吕”称嬴政,说明他是理解《史记》的褒贬称呼之意的。

另外,吴士连对“春秋笔法”的理解还体现在为君王立纪的升级上,这与司马迁《史记》本纪的编纂相似。在司马迁《史记》十二本纪中,项羽、吕雉并未称帝,司马迁却撰《项羽本纪》《吕太后本纪》,可见他对二人政治功绩的认可,有褒扬用意。而在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中,为征侧、征贰姐妹立《征女王纪》,也有褒扬之意。征侧、征贰姐妹是汉交趾郡雋泠县(今越南河内一带)人,在公元40年由征侧率先抗汉。后汉光武帝派伏波将军马援平定,征侧、征贰姐妹尸首送往洛阳。二征姐妹事迹在中国《后汉书》只有一句“伏波将军马援破交趾,斩徵侧等”,后于《晋书》《旧唐书》中也是寥寥数语,但《资治通鉴》载事较多。吴士连应是在《资治通鉴》二征事例上进行完善,为其立纪,有效仿《史记·陈涉世家》的“记首次”褒扬之义。而今在广西的部分伏波庙,民众在祭祀马援及其夫人的同时,也有征侧、征贰姐妹像于门口,如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云表镇六河村的伏波庙。除《征女王纪》外,《大越史记全书·土王纪》《大越史记全书·赵越王纪》等,均

是类此褒扬之意。

(二)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使用“借异传人”笔法

“借异传人”笔法,指的是《史记》往往借助异事来突出人物,塑造人物的独特之处。吴士连参考《史记》笔法,在《大越史记全书》中借异事塑造君王的异人形象。如《史记·高祖本纪》写刘邦异人状,自刘母写起:“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大越史记全书》塑造士燮的神异之处类于此,则是:“初,王尝病,死三日,仙人董奉与药一丸,以水含服,捧其头摇消之。少顷即开目动手,颜色渐凭。复明日,旋能起坐。四日复能语,遂复常。”此原是小注在《三国志·士燮传》之中,裴松之指出是葛洪《神仙传》说法。吴士连采取了《神仙传》说法,把他由小注变为正文,并在后面插叙“吴士连曰”强调“世传王既葬之后,至晋末,凡百六十年,林邑人人寇,掘发王冢。见其体面如生,大惧,乃复封瘞。土人以为神,立庙事之,号土王仙。盖其英气不朽,所以能成神也。”吴士连的说法在中国史书中不见,只见《太平御览》所录异苑一则相似:“苍梧王士燮,汉末死於交趾,遂葬南境。而墓常蒙雾,灵异不恒。屡经离乱,不复发掘。晋兴宁中,太原温放之为刺史,躬乘骑往开之。还,即坠马而卒。”可见吴士连搜遍中国历史、神话传说、笔记等材料编纂《大越史记全书·外纪》,正是他自己所说“臣取前《大越史记》二书,参以野史,辑成《大越史记全书》”,且深谙如何突出异人形象。这与司马迁择取素材,塑造人物的方式相仿。

同时,吴士连在塑造君王的异人形象时,采用的是《史记》互见法。吴士连在《纂修大越史记全书凡例》中说:“凡纪本事而涉前事,本事大书,前后事分注,庶得互见无遗。”互见法为司马迁《史记》首创,为避免叙事啰唆、重复,常在塑造人物时,以“语在某事中”互相参照。《大越史记全书》并无“列传”“世家”互见参照,吴士连所用互见法,采取了在同一外纪中利用大小传的方式前后观照,分注一般是采用小传的笔记对事件补充描述。如写李翁仲一事,下有小传互见:“唐赵昌为交州都护,常夜梦与翁仲讲《春秋左氏传》。因访其故宅,在焉,立祠致祭。迨高王破南诏,常显应助顺。高王重修祠宇,雕木立像,号李校尉。其神祠在慈廉县瑞香社。”极大增强了人物塑造的传奇性。

三、吴士连效仿《史记》“太史公曰”表达史家著史立场

《史记·卷一百三十》设有“太史公曰”论赞,以表达司马迁的史家立场。吴士连在前任史官黎文休、潘孚先的基础上,学习《史记》论赞,以“吴士连曰”表达史家立场。

《史记》“太史公曰”最早来源于《左传》中的“君子曰”,《史记·卷一百三十》末尾的“太史公曰”论赞,是管窥司马迁史事立场的重要之处。吴士连撰写《大越史记全书》时,越南已有黎文休《大越史记》、潘孚先《大越史记》,但今不传。据吴士连自己说法:“臣前在史院尝预焉,及再入也,而其书已上进,藏之东阁,莫得之见。窃自惟念,幸际明时,惭无补报,辄不自揆,取先正二书,校正编摩,增入外纪一卷,凡若干卷,名曰《大越史记全书》。”可见吴士连是在黎文休、潘孚先两书的基础上,修纂《大越史记全书》,故保留下“黎文休曰”“潘孚先曰”的传统,反映了越南史官的继承。同时,他添加“吴士连曰”表明自己的史事态度。这也导致在他之后的编者范公著、黎僖等人,在《大越史记全书》里保持了“论曰”的传统。“吴士连曰”与“太史公曰”有所不同:首先在位置上,既可能出现在事件插叙中,也可能出现在末尾,且不是每一篇外纪、本纪都有“吴士连曰”。“吴士连曰”插叙的频率远大于末尾。其次,“吴士连曰”的论赞,除表达史家立场外,也与《史记》“太史公曰”有所不同。除了评价人物、史事外,往往插叙“吴

士连曰”作为对事件内容的补充与强调。

如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赵纪》载南越王赵佗及其子孙一事。此在《史记·南越列传》《史记·酈生陆贾列传》《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有对照。在《大越史记全书·赵纪》中,吴士连先叙赵佗来越因由,“任器、赵佗帅师来侵”,塑造赵佗的外来者形象,此内容与中国史书大体相符,只是立场说法不一。而后吴士连借助神话传说和笔记丰富叙事。如赵佗一事就结合了《交州外域记》《岭南摭怪列传》里的金龟传说,塑造了安阳王、安阳王女媚珠、赵佗儿子赵始的形象。而在插叙里,“吴士连曰”先强调“金龟之说信乎”佐证金龟传说的真实,方才评论安阳王与赵佗史事,论二者成败。且化用了《孟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观点,以“若夫固国御戎,自有其道,得道者多助而兴,失道者寡助而亡,非为此也”表明自己的史家立场。

四、吴士连效仿司马迁著《史记》构建史学体系

吴士连作为越南史官,曾在官场变故受挫,因而有说法言其《大越史记全书》最早是仿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的私人撰书,此观点已逐渐被学界认可。吴士连版本的《大越史记全书》,则逐渐演变为官方认可的史书,后历范公著、黎僖等人完成。由于吴士连对“效马史之编年”“法麟经之比事”精神的领会,也可看出吴士连在对司马迁《史记》的学习、接受、效仿下,尝试构建越南的自主史学体系,且这个体系被后继的越南史官继承并完善。

首先,吴士连在《大越史记外纪全书·序》中就言明编纂越南史书的性质:“史以记事也,而事之得失,为将来之鉴戒。”这与先秦史书《春秋》的“右史记事”出发点一致。史书记载史事的功能,是用以劝诫君主,明辨是非,维护统治。可见吴士连有认识编纂史书性质的意识。他还列举了“古者列国各有史,如鲁之《春秋》,晋之《梲杌》,楚之《乘》事业”,认为越已自主,“与北朝各帝一方”,这可以看出吴士连有构建史学体系的意识。当然,吴士连构建史学体系的初衷,是在为越南封建王朝的合理性背书,所以他强调“纂《大越史记》之书,载前代帝王之政,粤肇南邦之继嗣,实与北朝而抗衡。”学者叶少飞论文《越南后黎朝使臣吴士连史学思想探析》也认可越南史学体系的建立,指出吴士连致力于建立一个“非中国”的传统。这是受到中国“明正统”史学思维影响后,所建立的史学创新体系,所以吴士连在《大越史记全书》前十五卷中,实际有内外记载之分。

第二,吴士连所尝试构建的越南史学体系,主要表现在“内帝外臣”观念上。“内帝外臣”是叶少飞论文《越南古代“内帝外臣”政策与双重国号的演变》所提出的观点,他认为越南历代对内使用“大越”国号称帝,对中国采用“安南”国号称王。这被明清王朝长期默认。实际上,在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外纪部分,内帝外臣的现象也并不少见。如土燮只是三国时期管理交州地区的一方首领,后继势力归入三国吴,《大越史记全书》为他立《土王纪》,赞赏的是他对交州的文明教化作用,即吴士连所说“我国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土王始。”体现越南尝试建立文教体系。另如《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前李纪》的李南帝李贲,在中国史书里,李贲之事只有寥寥数语,如《梁书》:“十年春正月,李贲于交趾窃位号,署置百官”;《陈书》:“先是,武林侯萧谡为交州刺史,以哀刻失众心,土人李贲连结数州豪杰同时反,台遣高州刺史孙回、新州刺史卢子雄将兵击之,回等不时进,皆于广州伏诛”。在《大越史记全书》中,以“李南帝”之称记录,且收录他的后继者赵光复(桃郎王)、李佛子(后李南帝)事迹(二者中国史书均不载),可见吴士连建立越南史学体系的迫切性。

第三,吴士连所尝试构建的古代越南史学体系,被他的

继任者保持下来,并逐步完善。司马迁作《史记·太史公自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汉时目录学还未建立,《太史公自序》对一百三十卷“本纪”“世家”“列传”等排列,使得后人在整理、传书时,不至于内容编排错杂,这是他对目录学的一大贡献。而吴士连虽然没有对十五卷《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大越史记全书·本纪》排列,但他所作《纂修大越史记全书凡例》,基本把这个史学体系的顺序固定下来。这被《大越史记全书》后来的编撰者范公著所继承,他延续了吴士连所创的“内外纪”史学体系,梳理、收录黎嵩《大越通鑑总论》、邓鸣谦《咏史诗集》等内容,完善古代越南的史学体系内容。

第四,由于《大越史记全书》成书时间是在公元15至17世纪,中国处于明清时期,儒学思想已相当成熟。司马迁写作于汉代,是儒学早期发展的阶段;与他不同,吴士连所处时代已深受中国儒学南传影响,故他在构建越南史学体系时,表现出对儒家教化思想的继承与创新,以维护越南封建王朝的统治。据叶少飞、田志勇论文《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十五卷略论》,吴士连曾经在官场上与黎圣宗有嫌隙。但当他的私撰史书要转为官方认可时,他明确了《大越史记全书》对建立古代越南完整教化的重要性,所以他说:“臣窃惟古有信书,国之大典,所以纪国统之离合,所以名治化之隆污。”强调借官修史学“治化”越南的重要性。此外,吴士连在“吴士连曰”的论赞中,多次强调了儒家“善恶有分”“宽仁有道”的教化思想。如《大越史记全书·外纪》载“涇阳王”一事:“吴士连曰:……据此所载,涇阳王,帝宜之弟,乃相为婚姻,盖世尚洪荒,礼乐未著而然者欤。”颇有《诗经》用《关雎》为首篇,列为“后妃教化第一”之意。值得关注的是,越南古代识字率并不高,吴士连史学体系的建立,大多对象是越南识字的官员。他们大多出身越南贵族世家,较少有寒族。吴士连在史书中,以儒家“君臣”“礼乐”等思想对这些官员进行教化,使得越南贵族们长期拥护越南后黎朝的统治。

参考文献:

- [1] 史记论丛(第11集)[M]. 张大可,田志勇,陈曦,编.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
- [2] 叶少飞. 越南后黎朝史臣吴士连史学思想探析[J]. 南亚东南亚研究,2020(4).
- [3] 彭崇超. 试析《大越史记全书》的体裁与体例[J]. 克拉玛依学刊,2023(1).
- [4] 丁光忠. 论《史记》与《大越史记全书》[D]. 天津:南开大学,2000.
- [5] (越)吴士连. 大越史记全书[M]. 孙晓,编.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 [6]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7] 杨伯峻. 春秋左氏传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16.
- [8] 骆春榕. 《史记》所见秦始皇姓氏辨析[J]. 黑河学刊,2011(10).
- [9]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 [10] 李昉. 太平御览[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11] 叶少飞,田志勇. 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十五卷略论[J]. 南亚东南亚研究,2011(4).
- [12] 叶少飞. 越南后黎朝史臣吴士连史学思想探析[J]. 南亚东南亚研究,2020(4).
- [13] 叶少飞. 越南古代“内帝外臣”政策与双重国号的演变[J]. 形象史学研究,2016(1).
- [14] 姚思廉. 梁书·陈书[M]. 管曙光,等,校点. 长沙:岳麓书社,1998.

The Acceptance of Sima Qian's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from *The Complete History of Dai Viet: External Chronicles*

PENG Guo-yi^{1,2}

(1. Guangxi Vocational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Nanning Guangxi 530006;
2. Guangxi Minzu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6, China)

Abstract: The Vietnamese Historian Wu Shilian had written the series historical books *The Complete History of Dai Viet: External Chronicles* (5 pieces) and *The Complete History of Dai Viet: Internal Chronicles* (10 pieces). He was familiar with Chinese historical texts, so his work was also compiled in the style of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and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He had imitated the writing style, time-ranking and narrative arrangement of historical events from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by Sima Qian, as well as *Comprehensive Mirror to Aid in Government* by Sima Guang and *The Compendium of Comprehensive Mirror to Aid in Government* by Zhu Xi. In terms of writing style, Wu Shilian adopted the "Spring and Autumn style" of criticism and praise used in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nd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and employed the writing techniques of "borrowing from other authors" and "cross-referencing" found i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so as to highlight the characters of the emperors. Meanwhile, he also imitated the commentary style of "the grand historian said" i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to express his stance on historical writing. Based on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Wu Shilian attempted to establish a historical system for ancient Vietnam and educate the Vietnamese officials. The ancient Vietnamese historical system he constructed was later inherited by later historians such as Fan Gongzhu and Li Xi, and was continuously improved.

Key words: *The Complete History of Dai Viet: External Chronicles*;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Wu Shilian; Sima Qian; acceptance

(责任编辑:陈思婷)

(上接第185页)

四、结语

总的来说,项目式教学为高职院校大学语文教学注入了新鲜血液,带来了活力,有助于提升大学语文在高职院校的地位。本文只是粗浅谈论了项目式教学在大学语文教学上改革与实践。高职院校大学语文项目式教学改革之路还很漫长,我们只要在教学把握住人文性与应用性相结合这一宗旨不动摇,大学语文之路将越走越宽阔。

参考文献:

[1] 杨桃. 项目式大学语文教学模式初探[J]. 长春师范

学院学报,2012,31(5):148-149.

[2] 顾春花. 高职大学语文课程的项目化教学探索[J]. 语文学刊,2016(12):108-110.

[3] 栾岚. 高职大学语文课程项目化教学实践研究[J]. 辽宁高职学报,2018,20(7):43-46.

[4] 王云江. 高职语文项目化教学研究与实践[J]. 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2016,25(4):74-77,82.

[5] 白银.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大学语文教学改革实践[J]. 广西开放大学学报,2025,36(2):84-89.

Research on the Project-based Teaching of College Chines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LI Mei-cun

(Hainan Vocational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ikou Hainan 571126, China)

Abstract: Most traditional college Chinese teaching is teacher-centered, with a focus on imparting foundational cultural knowledge and fostering humanistic literacy. Ground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1+X" certificate system pilot initiat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nstructivis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e of college Chinese instruc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underscores the imperative of project-based teaching reform. Project-based teaching embeds instructional content within real-world or simulated projects, prioritizing students' hands-on engagement. By integrating the foundational, humanistic and applied dimensions of college Chinese, this approach not only enhances teaching efficacy but also cultivates students' competence in solving practical problems, thereby aligning with the vocational-oriented training objectives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stitutions.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ollege Chinese; project-based 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e

(责任编辑:范新菊)